

孕育危机的东北

古屋奎二

一、“九·一八”事变前夕

中国的东北，是日本自明治以来一贯的侵略目标。

日本抱着如果没有东北的铁与煤，他就不能达成工业化，如果没有东北的农产品，他就无法自立的念头，故而认为有必要征服东北，将之属于日本支配之下。

因为是日本怀有这样的奢望，所以中、日两国在东北发生冲突，可以说是不可避免之事。

二、日军部蓄意侵华

1929年11月20日，新任日本驻华公使佐分利贞男为协商修订中日通商航海条约事宜而返回日本述职。

佐分利自杀带来恶兆

“佐分利贞男在箱根自杀”的报导，映入外交部长王正廷的眼帘时，是在他归国不久之后的29日。当时传说：佐分利之自杀，是由于他对中国的稳健外交意见未能为日本政府所接受——这不啻是中日关系前途的一种预兆。对于寄予期待的佐分利之死，王正廷表示了“非常遗憾”的吊唁之意。

佐分利贞男是在和中国政府方面交换了意见之后，准备对日本政府作重要的进言而回国述职，但这个当口，正在伦敦所举行的海军军缩会议而极度繁忙的外务省分不出时间来和佐分

利商洽中国问题。于是他的自杀，乃使日本因而失掉了转变对华政策的机会。

佐分利贞男未留遗书，以致关于他自杀的原因，有各种揣测出现。

佐分利是于11月28日晚间在箱根富士屋旅社寄宿，他曾表示明天要去东京，嘱咐服务员早一点叫他起床。并且在上午7时叫理发师来。

可是，第二天上午当服务员去叫他的时候，他右手握着手枪，击穿了太阳穴，死在房间里。

据重光葵所著“外交回忆录”——佐分利就任驻华公使，中国方面颇为欢迎，产生了对日空气已见改善、排日运动趋于缓和的效果。佐分利在和中国方面接洽之后，携带修订通商协定问题返国，和外省协商，但很难得到结论而延迟返任。于是，对佐分利寄予期待的中国方面，开始为之焦躁不安；好不容易才见好转的对日感情，看来又有冷却的光景。

正因为佐分利是在这个当口自杀，所以中国方面也大为惊诧。至于他自杀的原因，则议论纷纭——有说是在政治夹缝中左右为难；有说是受到胁迫；有说是出于厌世。

又据重光葵在其另一著作“昭和的动乱”中提到：“佐分利公使在东京滞留颇久，其后自杀辞世，颇不乏人认为：是由于政治因素，使他的意见不能实行的结果。”

又外相币原喜重郎则更指出：“右手拿着手枪，射击左太阳穴，说是自杀，怎能相信。”

继任人选发生纠葛

在佐分利贞男自杀之后，关于继任人选问题，中日两国之间发生了一点纠葛。

此时，日本拟调驻土耳其大使小幡酉吉，出任驻华公使，征

求中国政府同意，小幡过去曾任驻华公使馆参事（公使为日置益），是在交涉二十一条之际，公然蔑视中国态度的外交官。

在中国政府的立场而言，对这样的人物当然是不能给予同意的，尽管日本政府带着威胁地要求接受，但国民政府还是予以拒绝，而且民间反对声浪高昂，也纷纷电请政府断然抵制。结果，日本政府终于不得不放弃调任小幡酉吉的念头，而于1930年元月以上海总领事重光葵兼代公使职务。

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旋即与重光代办进行关税决定的交涉，至5月6日才终于协议签约，虽则是给予日本在3年内对于特定商品的税率不予变更的条件，但中国方面自此恢复了关税自主权。溯自1925年在北京举行的关税会议中，中国提出要求以来，已经历时5年之久。

币原外交遭军方排斥

象币原这样的外交态度，在日本国内则被认为是“软弱”而形成了问题，军部方面以及对华强硬论的人士们，对于币原外交心怀不满，反更背道而驰，趋向侵略路线。

加以当时世界经济，正遭受着空前不景象侵袭——这就是从1929年10月，纽约证券市场暴落开始，所造成的世界性恐慌。而日本对中国输出，则在世界恐慌之下，再加上受到济南惨案以来中国社会排斥日货的影响，以致极度恶化。日本为了要扭转不景气的境况，乃更增加了把富有资源的中国东北当做是“日本生命线”的重视；于是，在日本的军部中便日渐茁长了必以东北为所谓日本的“王道乐土”之论调。

在截至“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对“满洲”的投资达17亿日元，占其国外总投资额的60%；对于整个日本经济具有极大影响力。

又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据李顿调查团报告——日本

对中国输出额，以1925年的4亿6千8百万日元为最高；而其后则一直下降，及至事变前一年的1930年，则降落到了2亿6千万日元。另一方面，在伦敦所举行的海军军缩会议，也是日本军部不满的原因之一。当时，决定美、英、日海军舰艇为“五·五·三”比率的军缩协定，是在1930年4月签订，对此不满的军部，乃批判滨口内阁对外怯懦，并认为是“干犯统帅权”，酝酿出政治问题；而成为在这一年11月右翼暴力分子暗杀滨口雄幸首相的背景。

正当这样的情况下，中日两国在东北又发生了一个颇大的纠葛——就是葫芦岛建港工程问题。

本来，这只是中国国内问题，可是，日本却硬找借口，说是侵犯了日本在东北的特殊权益，尤其是南满铁路的利益。

三、日方密订侵华策略

葫芦岛筑港，是东北边防总司令长官张学良为了对抗日本经济侵略的一个计划。

张学良进行葫芦岛筑港

1930年元月24日，由北宁铁路局和荷兰一家建筑港公司签订了契约，建筑经费达640万美元，向美国及其他方面洽借。张学良在考虑葫芦岛建港之外，并打算在东北地区建筑与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线，其经费亦拟商借美、英资本。

过去向东北运输物资，是在日本租借地的大连港起卸上岸，再经日本经营的南满铁路运转；但如在葫芦岛筑成新港，而又能建好新的铁路网，则以后即可以葫芦岛为卸货起点，好由中国方面经手转运。

谁知认为南满铁路为其“生命线”的日本，则以：“此一计划，将使中国铁路包围南满铁路，以打击大连港，是有在东北

排斥日本之意。”而表示抗议。

当时，由于世界性的经济恐慌，中国东北的特产大豆、豆油、豆粕价格暴落，输出激减；又与大豆同为东北主要物产的煤炭，也为之停滞。因此，以输送大豆和煤炭的运费占其收入90%的南满铁路遂陷于营业不振，1931年，出现了自创业以来的最高赤字——340万日元。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学良所采取的对日强硬政策，给日本带来了强烈的危机感；于是在以军部等方而为中心、而强调危机意识的政治运动中，更高嚷出“满蒙是日本生命线”的口号。

板垣策划占领东北

1930年11月，东北的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管理；北宁、四洮、长春三铁路改为国有；同时葫芦岛港湾建设也隶属于中央指导。

至此阶段，日本对于东北的武力侵略计划，更迅速具体化。

其策划中心，为驻扎在东北的日本关东军。而推动者则为该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上校）和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佐。

板垣原任驻奉天日军步兵第三十三联队（团）长，于1929年5日调任现职（其前任河本大作因主谋炸死张作霖而被免职）。自板垣到职之后，他参加的“关东军情报会议”，便开始策划在东北发动全面军事行动的谋略。

在此之前的上年12月，实则已经有了一个由石原莞尔作成的“解决奉天闪电战术秘密计划”；但板垣则更在作全面战争的想法，打算设计包括东三省北部地区在内的作战计划。

板垣的第一步骤，是“北满战略旅行”。

1930年7月3日，板垣等日军参谋团由旅顺出发，经过长

春、哈尔滨、齐齐哈尔、海拉尔、泰来、洮南等地，作了13天的侦察旅行；特别对于在哈尔滨附近的攻防战，更有缜密研究。

然后，由石原莞尔依据旅行观察，整理了一个完全占领东北的方略——“满蒙占领统治研究”，其要点为：（一）平定阶段——将中国在东北的政治、经济体制完全覆灭。（二）统治阶段——使朝鲜人经营水田，中国人经营小商业，日本人经营大企业。（三）国防阶段——使获自东北的收入，足够扩充占领费用而有余。

此研究，是石原莞尔在东三省北部旅行中命令关东军司令部的属员佐久间亮三大尉（上尉）经办，佐久间在一年之间埋头研拟，于1930年9月最后定稿。当时，三宅光治参谋长根本未加审核，只是说了一句“会管用吧？”就盖了章；石原莞尔则含笑表示：“管用！还得要两年。”

翌年（1931年）5月，板垣更整理了“满蒙问题”处理案，包括有：（一）蒙古独立案；（二）间岛独立案；（三）北满骚扰案等内容。其中“北满骚扰案”，乃是要在东北制造反日大暴动，俾引以为关东军出兵的借口——可以说就是“九·一八”事变作战计划的底稿。

东京也在进行密谋

不仅在东北当地的关东军如此，并且东京方面也同时进行着各种阴谋，其中之一就是“灭亡满蒙秘密计划”。

这个秘密计划，是于1930年12月7日在拓务省大臣办公室聚集了拓务大臣松田源治、满铁总裁仙石贡、满铁理事木村锐市暨外务次官、参谋次官等协商决定的。

他们分析东北的情况，认为：“张学良与蒋介石乃一时性吴越同舟之妥协，预料两者之间将有战争，……斯时，为张作霖第二之张学良政权会为之瓦解，且有第三、第四、第五之张作

森接踵而起，分制东北之地盘。”于是，乃决定计划如下：

1. 奉方（张学良）欲将满蒙外交权名实皆归至南京，吾人取外宽内严的方法以反对之；现在仍以张学良为外交负责长官，并以其为交涉对象，保持帝国特殊地位及权益。2. 对奉方铁路网之建设，阻其实现；特以迫战求和策略，永保南满铁路与大连港之繁荣，俟天赐机会到来，可达帝国对满蒙最后之目的。

所谓“帝国最后之目的”，显然是以武力侵略东北与蒙古的意义。

四、日蹇蹇欲动

当武力侵略“满蒙”正在逐渐形成为“既定方针”的过程中，日本军方以中坚将校为轴心之急进分子的活动，也益见显著。

急进军人图发动政变

最好的事例，就是急进将校在1931年所发动的苦迭打——“三月事件”。

三月事件，是由以参谋本部俄国班长桥本欣五郎中佐（中校）为中心的“樱会”所策划。樱会，是中佐以下的陆军现役军官们为会员的秘密结社。他们的宗旨是——“以改造国家为最后之目的；为达此目的，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

他们觉得一旦在“满蒙”行使武力时，值得担心的是国际舆论，尤其是苏联的动向。在他们的心目中——“软弱”的币原外交，是不可能突破国际批判的。故而他们所着眼的“国家改造”，乃是要把军事色彩涂布在政治上，确立一个“以军领政”的政权。

对于樱会的急进论，有民间的右翼分子大川周明等人加以赞同。

他们所策划的“苦迭打”，是在打着这样的主意：3月20日前后，征求无产政党合作，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举行万人大会。会后，全体游行示威，前往国会，同时，以右翼浪人闯入警视（察）厅，造成混乱状态；立即借此时机，出动第一师团（师）包围国会，在军队的压力之下，由陆军少将小矶国昭和建川美次进入会场，强迫要求现内阁下台，并实现以宇垣一成大将为首相的内阁。

可是，这个苦迭打由于动员群众的计划失败，加以他们所推戴的宇垣一成在即将行动之前改变了态度，以致胎死腹中。

在军方如此冲击之下，“币原外交”也就面临了限界。

治外法权谈判决裂

于是，在中国外交部长王正廷和日本驻华代办重光葵之间所进行的撤废治外法权交涉，卒于4月间决裂。先是，中国曾在1929年12月向国外宣布：“取消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领事裁判权”，进而收回租界与租借地；但日本方面则一直强硬主张——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维持现状，乃终于达不成协议。

据重光葵“外交回想录”，对于交涉决裂的背景，大致有如下的说法：“由于张学良所采取的反日政策、葫芦岛建港问题，一连串的排斥日本人运动等因素，使中日之间的空气，逐渐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再加上军缩问题等契机，以致日本国内实在欠缺推进币原外交的背景；而相对地，中国方面在旺盛的民族主义思想推动之下，则正进行着革命外交。”

“过去，中、日之间的交涉，似乎有一种暗默的谅解，就是不涉及微妙的‘满洲问题’；而首先修改有关中国本土的不平等条约，使在两国之间造成良好空气之后，从而进行‘满洲问题’之解决。”

“可是王正廷的革命外交则非如此，对于日本在‘满洲’的

权益，和他国一例看待，并且要在短期内收回。”

“1931年5月，在南京举行的国民会议中决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对各国表示由单方面废除的决心，似乎有迫使实行的态度。”

关东军伺机行动

对于日趋迫蹙的中、日关系正在侧目注视中的日本军部，于6月12日成立了以参谋本部第一部长建川美次为委员长的一个委员会，委员有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及该课课长补佐冈村宁次、参谋本部编制课长山胁正隆暨支那课长重藤千秋、欧美课长渡久雄6人。

这个委员会整理出一个“满洲问题解决方案大纲”，其内容，是在“以一年为准备期间，然后再进入军事行动的方针之下，约束关东军在此期间内应暂时隐忍自重”，并对列强及日本国内进行“军事行动是出于不得已”的游说与说服工作。

同时在6月间，南满铁路总裁改由对华强硬论者的内田康哉出任。内田积极主张：（1）日本负责维持东北治安。（2）日本应依其特殊关系，确保在东北经济上的自由。（3）南满铁路采取两大干线主义，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实施吉会铁路的筑路权。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对于内田的主张也终于予以同意。故在当时日本新闻界一致报导：“币原外交”，已经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而驱向“积极外交”。

日本实则已经进入了战争的准备状态。

在南满铁路的主要车站，借铁路运输业务需用仓库的名义建筑军队营房；又在沈阳的满铁附属地工厂及住宅构筑防御工事，使之堡垒化。

日本在大连的警察本署，组成了特务纠察队8个队，进行间谍活动；城市和乡镇的日本人商店，也都成了关东军司令部的

特务机关，或者是由持有武器的在乡军人所经营。

“满洲日日新闻”的主持人佃野繁胜，也发表“满蒙之重大化与实力发动”一文，鼓动言论：“中国的反日政策，是和敌对的行动并无何等差异。所以，循普通外交交涉，以图维护我满蒙权益，求和平发展，实属于事无济；解决的方法，只有一个，是什么？就是实力的发动。”

到了这个程度之后，所剩下来的，就只是等待时机了。

此时，接连又发生了两个纠纷——“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就是这两个事件，点燃了关东军所装置的“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

（摘自李云汉编《九·一八事变史料》，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版。）